

反西方主义： 俄罗斯对西方“恐俄症”的历史回应

孙 芳

【内容提要】 俄罗斯思想中的反西方主义，其对立面是俄罗斯思想中的西方主义。它缘起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主要代表是与西方派激烈辩论的斯拉夫派。反西方主义最初反对的是西方派崇尚的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一流论、欧洲道路先进论，简言之，就是反对欧化改革、反对抛弃传统文化、反对迷恋欧洲文明。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认同中的“西方”概念发生了变化，范围扩大到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反西方主义的内容也随之延展，从最初的“反欧洲”逐渐演变到了后来的“反欧美”，并且由思想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地缘政治领域，从反欧化改革、反欧洲道路变成了反政治干涉、反经济制裁、反军事扩张、反意识形态斗争，从一种纯粹的思想争论演变成了付诸行动的政治博弈。

【关键词】 反西方主义 “恐俄症” 俄罗斯思想 反美主义

【作者简介】 孙芳，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自拜登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显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围堵力度，俄美、俄欧关系更趋紧张。最近以来，由于乌克兰局势问题，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外交关系再次恶化。一边是美国和北约的“外交双簧”，另一边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被迫停运，俄罗斯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普京已经通过话语和行动向美国和北约发出了强硬警告，提醒西方勿踏俄罗斯“红线”，而拜登似乎也决心要保护乌克兰，毫不让步，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俄副外长谢尔盖·

里亚布科夫甚至将此次对峙与“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可见局势之严重^①。

表面上看，这是俄罗斯在北约东扩层层紧逼下的又一次外交回击，事实上，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对抗并非在苏联时期才开始出现，俄国人的反西方情绪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俄罗斯反西方主义出现的历史语境是俄罗斯文化及思想的黄金时期——19世纪，也是俄罗斯民族自觉和文化认同的开端时期。它的出现离不开俄罗斯思想界最核心、最令人迷茫的问题——“俄国与欧洲”问题，抑或称为“东方—西方”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地理问题，更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文明冲突与文化传播的问题。从19世纪至今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社会精英一直都在思考和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讨论应该如何对待毗邻的欧洲和西方，应该如何选择俄国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方向，不断思考国家的定位和命运。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已经表明，西方国家的“恐俄症”由来已久，反俄传统根深蒂固，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理念和民族意识里也孕育并形成了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因此，反西方主义就是暗藏在“东方—西方框架下的一种心理结构，是俄国精神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②。

将“反西方主义”作为俄罗斯独有的现象是错误的，与“进步的”西方有关的集体自我认同问题出现在许多追赶现代化的国家。“反西方主义本身起源于西方，德国人才是后来蔓延全世界的反西方主义的先驱”^③，而当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传播到俄国时，就在这个独特的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文明那里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一 俄罗斯的“东方—西方”难题

何谓“东方”？何谓“西方”？俄罗斯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曾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英国学者齐亚乌定·萨达尔说，西方自身并非一直是“西方”，在17~18世纪“西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理名称，与“欧洲”同义^④。同样，在俄罗斯传

^① Рябков предупредил о риске повторения “кариб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https://ria.ru/20211209/ryabkov-1762985345.html>

^② 张昊琦：《俄国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

^③ 丛日云：《从“中体西用”到“以俄为师”：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误读》，载《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8月10日。

^④ [英]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统的思想认知里，历史上的“西方”尚不包括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美国，指的就是它的西方近邻——“欧洲”。然而，俄罗斯属于“欧洲”吗？从地理学上来说，“欧洲”这个广泛流传的名字最早指的是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帝国的西半部分，这同时意味着它是与西方基督教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宗教、政治、地缘的统一体。但与此同时，“欧洲”并不是一个闭合的整体，其地理范畴和文明观念在历史变迁中已经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欧洲’这个词并不指某个固定的历史实体：地理上，欧洲从未有过明确界定的东部边界；宗教上，欧洲一直包含着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语言上，欧洲从来不限于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政治上，西欧、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界限也发生过变化。”^① 所以说，欧洲事实上是多个存在差异的国家个体的多样性统一。

而俄罗斯作为“欧洲”大地上最为特殊的一个国家，位于西欧人眼中的“东方”，并横跨欧亚大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明开化的滞后而显得尤其格格不入。显然，俄罗斯并不是从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时期才开始参与欧洲历史的，而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在罗斯建国和罗斯人皈依基督教就开始了。尽管如此，“欧洲”的历史记载中关于俄国的内容却很少，后者经常被排除在外，一直无法完全融入欧洲人的整体观念认同之中，始终游离在“欧洲”的边缘。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在 1767 年曾明确宣布“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可她的偶像伏尔泰却在撰写彼得大帝统治史时表现出欧洲式的传统偏见：“莫斯科在欧洲几乎不为人知，直到沙皇彼得登上王位。他们天生就是与自己一样野蛮的统治者的奴隶，无知的他们被生活所累，不懂得任何艺术或手工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好处。古老的神圣律令将他们禁锢在死亡的痛苦下，未经族长的许可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使他们时刻感受到压迫的枷锁。这个国家在深深的无知和苟且度日的过程中忽略了与外界的各种联系。”^② 被尊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曾如此评价俄罗斯：不仅东方各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野蛮、落后、停滞的状态，不在世界历史的进步行列之内，欧洲的斯拉夫人也不属于这个体系，他们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处于被影响的地位，并没有对各种历史事

^① [德] 汉斯·约阿施、克劳斯·维甘特主编：《欧洲的文化价值》，陈洪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1 页。

^② 转引自 Кара - Мурза С. Г.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Парадигмы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1 год. С. 106.

件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①。黑格尔甚至认为斯拉夫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断言俄罗斯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并认为他们在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中毫无建树^②。直到苏联解体之后，身处欧洲大陆东部的俄罗斯仍然得不到西方的认可，美国学者亨廷顿直言，“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③，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自成一种独特的欧亚东正教文明，“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④。因此，纵观整个欧洲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这个一直被视为“异端”的“东方”大国自古以来就不受西方人的喜爱，西方邻居们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来排除它，所以“五百多年来确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上”^⑤。正是这种身处欧洲大陆却得不到接受和认可的尴尬境地使得“俄国与欧洲”问题——“东方与西方”问题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症结，成为主导民族精神文化遗产的“俄罗斯思想”的核心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无数俄国社会精英毕生探求的历史疑问，也是国家当权者始终力求破解的外交难题。

俄罗斯是否属于“欧洲”？对此，俄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在彼得改革之前，俄罗斯社会意识曾长期处于朦胧状态，并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定位和文化属性。18世纪初，彼得大帝大刀阔斧地推进现代化改革，强行拨动了俄罗斯历史的指南针，让其指向了“西方”。于是，受欧化教育的俄国上层精英开始认定自己是“进步”和“文明”的欧洲人，将俄国文化中所有落后的弊病统统归罪于蒙古鞑靼桎梏等东方因素。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震动了俄罗斯社会，唤醒了民族意识，使俄罗斯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俄国思想家们在爱国主义的呼唤下努力思考俄国的东西方属性这一历史文化命题，力求找到俄罗斯民族的正确发展道路。他们深入剖析，挖根寻底，并掀起了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这场思想之争穿越了两个世纪，直到今天仍然牵动着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在与西方恐俄情绪对抗的过程中也诞生了若隐若现、时强时弱的反西方主义话题。

① 参见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6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④ 同上，第120页。

⑤ [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二 直觉牵引中的反西方主义：追赶西方

在 9~18 世纪这大约 900 年的时间中，俄罗斯人头脑中的“西方”代表的是位于自己西部的“欧洲”，后者对俄罗斯的仇视和恐惧始于 11 世纪的基督教会大分裂。由于斯拉夫人继承的是拜占庭的东正教，于是成为天主教西欧人意识里的“敌人”，这种宗教分歧引发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恐惧而产生的仇恨衍生了多次惨烈的战争，最终也未能改变天主教与东正教分庭抗争的事实。直到启蒙运动兴起，理性之光驱散了宗教愚昧，基督教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这场宗教对抗才逐渐淡化，尽管并未从欧洲人的头脑中消失，但终究让位于对自由、民主、平等和文明的追求。这一阶段俄国人看待西方这片土地更多地是用“未知”和“好奇”的眼光，虽然经历了多次流血冲突，但在潜意识的指引下对这种异样文明逐渐产生了“赞赏”和“崇拜”。此时的俄国人反西方意识尚处在最初的朦胧阶段，更多的是受到直觉的牵引，一方面他们不甘于西方异族的侵扰，为了维护土地归属和民族独立而英勇作战，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自己在宗教上与西方不同，希望继承拜占庭的衣钵而成为东欧平原上的特殊国度。

由于处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交汇结合之地，历史上的斯拉夫人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良格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蒙古鞑靼人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早在公元 9 世纪东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流域生活并获得初步发展时，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便参与到了罗斯早期国家及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根据《往年纪事》记载，大约在 9 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的东斯拉夫人曾起来反抗瓦良格人，并把他们赶下海，不再向他们纳贡^①。然而，“自瓦良格至希腊”的商道使得斯拉夫人们对这些来自北方的诺曼人又爱又恨，甚至后来还邀请了留里克兄弟帮助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土地。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联系不仅带动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让斯拉夫人了解到了基督教文明。从 988 年开始，俄罗斯人打开了接受基督教的大门，事实上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首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从此，基辅罗斯跨入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行列，基督教文化开始在罗斯的土地上迅速渗透，即使是长达 240 年的蒙古鞑靼桎梏时期，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也未被中断。然而，就在俄罗斯人挣扎于金帐汗国统治的时期，来自西方的异族曾屡次企图趁机而入，得力

^①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 页。

于王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领导，俄罗斯人将瑞典人和德意志骑士赶出了自己的地盘。15世纪末，俄罗斯人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领导下击败鞑靼大军，大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混乱时期”的俄罗斯历史是在与西方强国的抗争中展开的。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西方是以波兰立陶宛王国为首的整个西方文明世界。波兰人暗中支持伪德米特里王储夺取莫斯科王位暴露了其对俄国国土的觊觎，而瑞典军队则一如既往地诺夫哥罗德虎视眈眈，民族英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挺身而出带领俄国民众将他们驱逐出境，使国家领土得到了统一。可以说，此时的俄国与西方关系还是一种原始战争状态，针对西方异族的攻击行为，斯拉夫人选择了以牙还牙，用武力反对西方。

在经历了数百年与西方隔绝的封闭落后之后，俄国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登上王位后，随着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如果说彼得一世导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大剧，那么阿列克谢则拉开了俄罗斯欧化的大幕^①。无论是阿列克谢沙皇，还是彼得大帝，无论是主动地引进，还是强制性学习，西方化运动都标志着俄国对西方文化的长期敌视戛然而止^②。18世纪的俄国人开始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文明方式与西方相处。

不管彼得大帝以多么严厉和粗鲁的方式进行改革，他还是把俄国人带进了西方文化的世界。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彼得大帝所选的道路是必然的，俄国的发展离不开同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接触。“西方问题对俄国来说不是偶然的，在俄国的发展道路上同西方的交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③ 津科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赞同。18世纪的俄国人对西方文化达到了迷恋的程度，那些被派往国外的年轻人甚至成了西方精神的“俘虏”。冯维辛通过《旅长》的主人公伊万说：“我的身体生在俄国，但我的精神属于法兰西王国”；仔细读《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信》会深深感到卡拉姆津眼中的欧洲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青年时代的赫尔岑沉醉于西方的思想和观念；博特金曾在一封信中说过“对俄国人来说，欧洲的一切都充满一种神秘的魅力”；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一句非常

① 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42页。

③ [俄]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著名的话：“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俄国和西欧。”^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俄国的西方化从最初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权既倡导俄罗斯的欧化，又竭力限制这一进程。一方面，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巩固现存制度和支撑对外政策，俄国需要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按欧洲的标准来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当然是需要面向欧洲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担心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社会学说损害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因而试图使俄国隔离于西方，并且在防范新思想传播的同时，大力宣扬关于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是俄国历史发展基本条件的观点，提倡“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独特意识形态。因此，彼得大帝时期的农奴被进一步限制自由，他们被更紧地束缚于土地之上和地主之手；因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得知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既痛苦又悲伤”地断绝了同法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并组织了反法同盟；因此，拉吉舍夫和诺维科夫等人被捕并被流放，十二月党人被尼古拉一世无情地残酷镇压，秘密警察和书刊检查机关对所有的学校、社会组织、剧院、军队进行严格监督……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欧洲的传染病”渗入俄国。位于西方的欧洲的确是进步的、文明的，但是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复杂、多样的“西方”？俄国上层社会出现了分化。显然，沙皇政府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阶层看待西方文明的角度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意识中对“西方”的认知基本等同于地理上位于自己西部方向的西欧国家，此时的“西方”形象是一种强大的西方邻居的印象，这种印象是简单朴素的。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强国和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分属两个宗教区，自然也就分裂了，俄罗斯拜占庭化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反西方化。尽管这些西欧国家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但俄国人对欧洲的态度并未受到宗教分歧的较大影响，毕竟无论是信仰天主教的西方，还是信仰东正教的俄国，都是基督教文明教化的一分子。相对而言，反而是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差异让双方有了距离感，让落后的俄国人有了追赶的心理。从最初的武力回击西方，到后来的学习西方、迷恋西方，再到谨慎地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俄国人在心灵的指引下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探索。一些人被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吸引，一些人关注西方对教育的重视，还有一些人崇尚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对自由的追求。也许是因为自身的精神贫乏导致了当时俄国人对西方的热爱和向西方的紧密靠拢。然而，就在

^①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С. 13.

这种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俄国的反西方意识也在悄然成长。尽管这个阶段的反西方意识整体上还是模糊的，尚未形成清晰的轮廓，但日渐强烈的对西方的迷恋不止一次地刺激了其反西方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18世纪才刚刚开始形成，但随后便逐渐影响并主宰了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①。

三 思想探索中的反西方主义：辨识自我

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人的恐俄情绪变得愈发强烈，他们用更矛盾、更警惕的眼光看待这个位于自己东方的帝国。此时的俄罗斯已然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一个很有分量的成员，任何与沙皇政府打交道的国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让亚历山大一世狂言“欧洲就是我们”，并以整个欧洲救世主的姿态傲视巴黎^②。这不仅仅是由于俄国在打败拿破仑之战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是由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文化的辉煌繁荣。如果说此前西欧人感兴趣的是西方旅行家们笔下描写的斯拉夫民族风情，那么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欧人才真正发现了俄罗斯。他们开始明白，再也不能从远处审视俄罗斯了，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国家，也不仅仅是民族风情方面的猎奇对象。随着仔细打量的目光越来越多，西方的“俄罗斯神话”逐渐成型，一方面俄罗斯仍然被欧洲人看成是一种另类的外省文化，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成就的世界性影响也不得不令欧洲人刮目相看，同时，欧洲人也发现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和侵略的堡垒^③。正是由于这种复杂多样的认识，欧洲的“恐俄症”在19世纪变得深刻而极端，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敌视情绪刺激了俄国社会精英的心灵，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反西方主义情绪和对自身发展之路的精神思考。

模仿是俄国人屡遭西方观察者所诟病的一个特点。西欧人并不喜欢彼得大帝，他在俄罗斯发起的欧化运动恰恰成为西欧人鄙视俄国人的原因之一，许多西欧人对俄国人将西方文化生搬硬套到自己身上而感到愤慨。以屈斯蒂纳为代表的许多西欧人曾对俄国贵族模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这位俄国负面形象的著名描绘者在自己的游记中曾经毫不客气地写道：“我不想因俄国人的所作所为而去责备他们，但我要谴责他们企图变成我们这个样子的野心。他们根本还没有

① [俄]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230页。

② [英] 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2卷），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

③ [俄] 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

开化，假如他们从未像猴子那样去模仿其他民族，也从未像猴子那样嘲笑被模仿的人们，那么他们还有希望成为那些民族。而现在却只能认为，这些人对原始状态来说是被遗忘的，可是对文明状态来说却又不适应的。”^①事实上，几乎就在同时，俄国人的头脑中已经不止是迷恋和模仿，围绕一个多世纪前彼得大帝欧化改革的争论已经出现，它牵动着无数爱国精英的思绪，并导致“俄罗斯思想”的形成。整个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们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他们直面西方的仇视，不再愿意继续追随，而是希望找到属于俄国的道路。正如历史学家瓦卢耶夫所说，“虽然我们跟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但也不能忘记，当学生自身的独特力量被唤醒，而且他可以由此建立起独立的生活和自觉的思想时，老师的课程也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②。

如果说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最终形成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那么这两个对立派别在 30 年代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提出和理解是一致的，其指导思想都是在德国哲学基础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关于人民性的学说，即关于每个民族的“历史使命”的学说。所有敏锐的俄国学者都在哲学和历史学范畴内提出了这一问题，对西方的批评在这里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俄国与西方”问题首次出现并逐渐清晰，所有的知名思想家都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正是从莫斯科小组和圣彼得堡小组的讨论和争吵中诞生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

反西方主义通常被等同于斯拉夫主义，事实上并非如此。对俄罗斯思想家而言，“西方”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矛盾体。虽然斯拉夫主义非常尖锐地批评西方，但很多斯拉夫主义者身上融合了对它独特和深刻的思考；同样，不少西方主义者身上也透露出了对它理性和辩证的评价。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他们对祖国俄罗斯真挚而深沉的热爱。赫尔岑是这样论述当时的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的：“我们大家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西方情绪中所蕴含的爱祖国、求真理、寻发展恰恰成为联结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纽带。

霍米亚科夫说：“西欧的起源是一种，而我们的是另一种”^④；康斯坦丁·阿

① Кюстин А. де. Россия в 1839 году (основной том). СПб.: Крига, 2008. С. 138.

② Валуев Д. А.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Сборнику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ах ей единовѣрных и единоплеменных. М., 1845. Ч. 1)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Pro et Contra. СПб., 2006. С. 215.

③ [俄]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8 页。

④ Хомяков А. С. Письмо в Петербург //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М., 1988. С. 75.

克萨科夫说：“俄国是一片完全独一无二的土地，与欧洲国家完全不像”^①；基列耶夫斯基指出，决定整个欧洲向前发展的是“罗马教会、古罗马世界和由于战争而出现的国家体制”，而这些完全是“俄国的异类”^②。可哪怕是將欧洲看作异类的早期斯拉夫派思想家也已经意识到，向西方老师学习的进程不能是无限度的，在效仿西方老师的过程中不能丢失俄国学生自身的特质。尽管他们承认西方在世界活动中首先提出并唤醒了科学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而西方人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有益的，但俄罗斯必须理智地向西方学习，特别是西方科学，更应当“自由、理智地接纳、保存并发展它”^③。

而把欧洲看作文明化身、模仿对象、鲜活榜样的西方派，也并未对欧洲的不足和另一面视而不见。别林斯基指出，向欧洲学习完全不意味着要将俄国人变成法国人或德国人，“我们想要成为拥有欧式灵魂的俄国人”^④。对欧洲从喜爱到厌恶最终走向失望的赫尔岑，在接触欧洲之后承认“俄国人在语言和种族上都属于欧洲大家庭，是纯正的欧洲人”^⑤，但俄国人仅仅是欧洲民族大家庭的“某个表兄弟”。赫尔岑很清楚，俄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欧洲，但他也发现了欧洲在道德上的堕落，看到了欧洲法律的表里不一，欧洲革命者的不彻底性，看到了欧洲不愿从过去的遗产中挣脱出来，而且每况愈下。所以他最终呼吁俄国不能盲目效仿欧洲，“是时候站起来了”^⑥，而且俄国有能力这样做，“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走得比欧洲更远，也比它更自由”^⑦。西方派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在俄国建立欧式新社会的可能性持批判态度，他们尽管拥护民主价值观，反对封建专制，但却认为国家的进步与其内部潜力有关，并未把欧洲看作社会政治发展的万能模型。

身上融合了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种倾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强调“欧洲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欧洲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俄国一样宝贵”^⑧，但同时也认为俄国人“不可能变成欧洲人，我们不能把自己硬塞入一种西方式的生活，因为这是欧洲根据自己独特的民族起源创造出来并形成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异己的

① Аксаков К. 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1. Сочи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 1861. С. 7.

② 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России // Ран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Сост. Н. Л. Бродский. М., 1910. С. 13.

③ Хомяков А. С.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14. С. 57.

④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Россия до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1954. С. 141.

⑤ Герцен А. И. Концы и начала//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 М., 1958. Т. 7. С. 531.

⑥ Герцен А. И. Письма из Франции и Италии//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 М., 1956. Т. 3. С. 223.

⑦ Герцен А. И. Концы и начала//Сочинения. В 9 т. М., 1958. Т. 7. С. 531.

⑧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 Т. 18. С. 23.

和排斥的”^①，俄国人应该为自己创造新的形式，创造独特的、根植于俄国土壤的、来源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本源的形式，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是最独一无二的”^②。

克里米亚战争让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意识到了同西方相比自身在技术和社会上的落后，意识到了俄国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欺骗和缺陷，与此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西方的敌意。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人的自我意识由于西方对斯拉夫民族的深刻仇恨而更加清醒，对西方力图从政治上排挤和削弱俄国的认识更加清晰，因此，反西方意识也越来越强烈。晚期斯拉夫派眼中的欧洲形象不单单是“异类”了，它还被看作俄国强大而危险的潜在“敌人”；为了对抗这个“敌人”，俄罗斯应该摒弃彼得一世及其拥护者人为强加于传统俄罗斯文化的那些欧洲因素。

最早洞悉西方敌对性的思想家是丘特切夫。他不仅是俄罗斯文学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丘特切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考者，他感到“俄国只有办公室和营房，一切都围绕着鞭子和官衔而转动”，但他又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丧失理智的行动”。他的政治观点接近斯拉夫派，但因受欧洲影响而又与斯拉夫派有所不同。由于他长期在慕尼黑、热那亚和都灵从事外交工作，可以密切观察西方和俄罗斯一些贵族和知识分子对俄欧关系的态度。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西欧国家对俄国的敌视加剧，这一切都反映在丘特切夫的政治诗歌、文章以及未完成的论文《俄国与西方》中。他发现，在当时的西方，有一种针对俄罗斯帝国和俄罗斯人的厌恶和恐惧情绪在不断增强，其原因是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俄国从欧洲排挤出去。因此，他在 1867 年写给亲戚的一封信中指出了“恐俄症”的存在：如果说早些时候，这些人批评尼古拉一世时代缺乏权利和新闻自由，那么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期间，当自由似乎已经得到加强和维护时，厌恶仍然越来越多^③。

丹尼列夫斯基的反西方情绪与之前的斯拉夫主义者相比要更加明显。“不能自欺欺人了！欧洲的敌对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解决甚至继续缓和内部斗争的同时，欧洲将使浑身解数针对俄罗斯，将俄罗斯看作自己的天敌。”^④ 丹尼列夫斯基强烈批判俄国人自彼得一世时期起就患上的“仿欧病”，认为这种陋习会

①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 Т. 18. С. 36.

② Там же.

③ Русофобия в России: е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и критики. <https://pravoslavie.ru/analit/rusideo/rusophobia.htm>

④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М., 1991. С. 401.

使俄国人头脑不清，丧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主动性，从而忽视自己民族的特色和文化遗产。“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起源上还是在传承上，都不能将俄罗斯看作是欧洲的组成部分”，俄罗斯“本身的气质就与欧洲世界不同”。虽然俄罗斯从彼得时期欧化的道路上崛起，但对于俄罗斯来说，“欧化”却是极其病态和致命的。“这种病在总体上会阻碍俄国人民伟大命运的实现，而且，在民族精神的独特根源麻木和僵化之后，可能会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生活丧失内在的创造力，从而最终导致这个民族本身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和多余。”^①因此，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要尽快解决这个制约着俄国乃至整个斯拉夫民族未来和命运的问题。列昂季耶夫是丹尼列夫斯基的追随者，他反对一味地模仿欧洲，认为这样做的后果就摧毁了俄罗斯身上那些无比宝贵的东西，“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与欧洲变得一致……我们要努力丢弃一部分过去，希望将来可以转到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上去”^②。

19世纪下半叶反西方主义情绪最强烈的政治思想家是伊万·阿克萨科夫，他凭借独特的个性、敏锐的眼光、清醒的头脑发表了许多针对西方的政论性评价。他在1861年写道：“西方对斯拉夫东正教世界那种本能的仇恨是隐藏着深刻原因的，这种原因就是——两种相互矛盾的教育原则的对立和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仇视。我们是时候该接受挑战，并为我们自己、为斯拉夫兄弟们勇敢地同欧洲政论作品进行战斗了。”^③他犀利地指出，“其实欧洲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东西方划分理论，而且四处宣扬：东方应当沦为西方的奴隶，俄国人不属于西方，而是东方，俄国是东方的主要力量，因此整个历史运动、西方欧洲的所有力量都应当集中在反对俄国人的身上。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在称呼和地位上都不会得到提升。在他们眼中，我们仍然是蛮夷之邦，根本算不上文明世界的遗产”^④，因此西欧害怕俄国同斯拉夫民族走到一起，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西欧所有政策的目的在于破坏俄国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关系。伊万·阿克萨科夫直言不讳：“在文明程度高的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双重真理，一种是针对自己，对罗曼-日耳曼语系的民族或在精神上靠近他们的民族，另一种是针对我们和斯拉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 299.

② Леонтьев К. Н.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теории 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жизни. //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Pro et Contra. Антология. СПб., 2006. С. 538, 537.

③ [俄]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243页。

④ 同上，第77~79页。

夫人。”^①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命运，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后，西方世界用更加惊恐的眼光看待这个突然诞生的红色帝国，而俄国也被历史推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面对来自西方和内部的种种质疑，俄罗斯人开始从两个方向看待自己：身处苏联和身处欧洲，这使“俄罗斯思想”的发展不得不面临新的考验。当时数十万俄罗斯人逃亡到欧洲，两艘“哲学船”送走了众多试图重新思考如何对待祖国的杰出人物。令人吃惊的是，身处欧洲的俄国侨民依然保持着对俄国的热爱和日益明显的反西方主义情绪。也许正是因为身处欧洲，他们才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西欧是不同于俄罗斯的土地，认识到俄罗斯的非欧洲性。“西方文化和东方的俄罗斯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另一种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还有另一种独特的精神秩序。”^②也许正是因为身处欧洲，让他们更加思念自己原本的家园，从而希望苏联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俄罗斯，一个凭借自身千年历史扎根于欧洲的俄罗斯”^③。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下，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境外的土壤中孕育而生。这些指明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俄罗斯文化是欧亚文化的境外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了俄罗斯思想，为前人的对立和争吵找到了第三种答案，使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实现了融合，也让俄罗斯人的反西方主义拥有了一种新的面孔。尽管欧亚主义者的很多论述都与保护东正教文化思想有关，但他们仍旧热衷于同西方的斗争。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尼·谢·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宣称同欧化作斗争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统治阶层（政府和知识分子）为向欧洲学习借鉴俄国所必需的科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欧洲在技术上已经超过并威胁到了俄国。这一阶层欧化得太严重了，以至于已经失去了自身的俄国灵魂，但又不具备欧洲的气质。它保留了俄国人的特性，甚至是俄国人特有的天赋，但是没有保留他们的俄罗斯思想”^④。因此，对俄罗斯来说，“摆脱了鞑靼人的桎梏之后，也应该摆脱来自欧洲的桎梏”^⑤。也许是历史的安排，欧亚主义者独辟蹊径的观点表达了俄罗斯人深刻的自我认知，使“俄罗斯思想”的探索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的想法在当时得到了不少杰出思想家的赞同和拥护，

① [俄]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 244 页。

② Ильин 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 Наши задачи. М., 1992. Т. 1. С. 58.

③ Вейдле В. Пора России снова стать Россией. <http://www.golubinski.ru/vestnik/articles/pora.html>

④ [俄]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3 页。

⑤ 同上，第 208 页。

如别尔嘉耶夫也认为“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都没能参透俄罗斯灵魂的秘密，要想弄清楚这个秘密，需要走第三条道路，要超越东、西方两种本原的对立”^①，也就是欧亚主义的道路。仅凭这一点就应该对欧亚主义者作出肯定的评价，是他们为几代前人苦苦思索的难题给出了新的答案，并创造出一种理智而现实的反西方主义思路。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展开辩论到20世纪30年代欧亚主义思潮停止活动的一百年间，是俄国思想界最兴奋、最活跃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都参与到了民族身份和文化属性的大讨论中。俄国人的自我意识不可避免地同西方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无疑说明了俄国在历史和精神上与西方的不可分割性。这一时期俄罗斯人眼中的“西方”形象从进步发达的文明领袖到独特而非普世的文明类型，再到敌视斯拉夫的西方邻居。经历了迷恋西方、认识西方、思考西方、批判西方的过程，俄罗斯人在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探索中完成了对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定位的历史任务。凝聚了俄罗斯精神核心的反西方主义就像是磁铁的中心，在相互作用中保持着两极磁场的平衡。尽管也曾出现过激进的反西方主义，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反西方主义相对还是温和的，呈现出一种思想层面的话语形象。这一百年不仅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黄金和白银时代，也是俄罗斯思想的辉煌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彼得一世欧化改革的目标实现了，他撇开过去的俄国，依靠西方的成果，为的就是塑造一个新的俄罗斯，这位“俄罗斯伟大的变革者一开始就没有把模仿西方作为自己的任务，他的任务是将国家变成一个能体现最先进技术和其他成果的强国”^②。

四 政治实践中的反西方主义：话语博弈

20世纪初期的世界历史经历了大变革和大震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霸权，西方文化优于一切的思想受到了挑战。当战后的欧洲还沉浸在西方正在没落的悲观情绪中时，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壮大起来，而欧洲东部俄罗斯境内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随后建立的“红色政权”无疑令所有西方国家的恐俄情绪更加强烈，它们对这个“门槛上的野蛮国度”变得更加陌生。

^① [俄]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② [俄] 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十月革命开启了俄国与西方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它事实上使俄国脱离了欧洲，并最终使二者在政治和文明上形成对抗，变成了两个世界和两种制度的对抗。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反西方的象征，而苏俄领导人在世界各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实现国际和平的远大目标更让反西方主义变得色彩鲜明。汤因比说：“1917 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再度大大强化了俄国人情感和思想中的反西方倾向。同时，苏联一跃成为仅存的两个世界强国之一，从而把文化冲突重新引入政治舞台。”^① 在西方人的眼中，布尔什维克掌权下的俄国不仅是战争的源头，还是一种社会威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致命挑战。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②，而当俄国现代化与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自己国家之后，它便在俄罗斯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并且孕育出了标新立异的反西方色彩。“俄国共产主义者用一种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是一种与流行的西方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来反对现代西方。”^③ 苏联成立之初，以英、美为首的“红色恐慌”情绪和外交打压政策使苏联处于广泛的被孤立状态，“新建立的苏联在欧洲的外交格局面临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那股视图公开颠覆自己的外交同盟并想要推翻其社会政治体系的政权力量”^④。尽管也曾有不少西方知识界人士在经济大危机导致的社会萧条和精神空虚中远赴“新大陆”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境界”^⑤，也曾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给予过肯定的评价，但西方从未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失去芥蒂和减少敌视。

1933 年纳粹分子在德国上台，希特勒政权扬言要铲除布尔什维主义，将苏联的领土变为德国人的殖民地。在这种局面下，国家安全在苏联外交政策中享有绝对优先权，苏联竭尽全力展开外交，以促进自身与西欧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差异成为这一阶段官方话语中的主要问题，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层面逐渐走向次要地位。此前热闹的文明优劣争论似乎已在欧亚主义的终极结论中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制度不同导致的意识形态评价。

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怀着不安、迷惑和恐惧注视着苏联内部发生的一切，他们认为苏联既不是一个令人满意也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英国首相内维

①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38 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31 页。

③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第 741 页。

④ [英] 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 3 卷），第 483 页。

⑤ 张建华：《帝国幻想：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8 页。

尔·张伯伦在憎恶苏联的情绪中反复强调自己对苏联“极度的不信任”，对苏联的“自由”思想深表反感，并对苏联能否向德国发动一场成功的军事战争表示怀疑^①。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和英国在共同的纳粹敌人面前才终于向苏联发出了结盟邀请和军事援助的承诺。战争的爆发令苏联的反西方情绪暂时被反法西斯主义和爱国主义所替代，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暂时变成了对法西斯德国的仇恨。在这场极具破坏性的空前大屠杀中，苏联红军的英勇无畏被永载史册。一位德军的总指挥曾这样评价：“无论在哪里，苏联军人都会奋战到最后一人。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才会投降。”^②

二战无疑让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然而胜利过后，它却发现自己的处境并非像此前预期的那样乐观。虽然苏联以惨重的代价赢得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但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友邦关系却在相互猜忌中瓦解了。原因很简单，共同的敌人已经被消灭，战前彼此之间的敌视又开始滋长。而且，此时的西方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个强劲的新对手虽然与苏联没有任何领土纠纷，但在政治体制、文化价值理念和世界观上却极具实力。一个世纪之前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的预言成真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他们“都好像收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③。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两大阵营的形成，苏联与美西方之间的较量彻底变得毫不掩饰。

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抗显然主要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争夺地缘政治利益、取得军事优势、扩大势力范围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是地缘政治对手，而且是阶级敌人。这种对抗更多是政治性的，基本上剔除了传统东西之争中的文化和文明的意义。”^④然而，在当权者的政治理念之中却暗藏着民族性格和文化价值观的力量，很多时候他们作出的外交决策不仅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有关，也是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结果。自古以来就根植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让追求世界革命的苏联在与欧美西方的政治博弈中强化了自身的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情结，也强化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有学者认为，苏联的历代领导人其实也是西方主义或斯拉夫主义的拥护者：坚持世界革命理想的列宁是西方主义者，主张

① [英] 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3卷），第486页。

② 同上，第489页。

③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28页。

④ 张昊琦：《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载《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5期。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是斯拉夫主义者，提出“和平共存”理念的赫鲁晓夫有西方主义倾向，过于保守导致“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有斯拉夫主义倾向，进行“新思维”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主义者……这种观点究竟包含多大程度的理据性尚且值得讨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确实重新激活了俄罗斯社会舆论的东西方争论。“传统的东西之争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本土似乎戛然而止，但在苏联时期的默默隐迹并不代表它的中断。它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重新兴起，并且以不可阻遏的势头，仍然成为新俄罗斯构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重要因素。”^①

苏联解体带来的去意识形态化和思想真空让俄罗斯人再次陷入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迷途，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一个半世纪之前的状态，再次出现了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本土主义）之争。历史惊人地重现，只不过这一次的争论已经不是单纯思想和文明分析，而是成为国家政治外交的体现。然而，俄罗斯所发生的制度易帜和民主化变革从总体上未能使西方从根本上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无论是沙皇时期，还是苏维埃政权时期，俄罗斯传统在西方通常只会引起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国内的独裁统治和沙文主义导致了向国外实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评价是永恒不变的——诸如此类的判断也同样具有反射性的。”^② 所以，尽管苏联解体之初的俄罗斯政府曾经竭尽全力照搬自由民主的西方模式，但彻底抛弃传统价值和苏联体制的激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成功，西方也没有如想象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这个“改头换面”的老对手。从主导一个世界阵营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而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不仅令社会精英阶层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更让广大的俄罗斯民众无法相信国家的瞬间衰落。“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本土派知识分子集中批评的是日渐腐朽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么 90 年代初令爱国人士所更不能忍受的是叶利钦的亲西方主义政策。”^③ 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全面失败和叶利钦亲西方外交政策的落空都强烈刺激了俄罗斯人骨子里的反西方情绪，从而使此时的“西方”演变成了完全的“敌人”形象。

以盖达尔等人为首的西方派由于承担转型失败的责任而在政治舞台上逐渐被

^① 张昊琦：《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② 转引自〔俄〕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第 361 页。

^③ Ольга Малинова,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в XX век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дискурс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РОССПЭН, 2009, с. 158.

边缘化，在这场东西之争中的话语权也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斯拉夫派力量逐渐壮大，观点也纷繁复杂。“虽然东西之争没有成为本土派的独角戏，但作为对俄罗斯西化的反动，本土派的影响力由于有传统精神的支撑以及外部世界的刺激而不断增大。作为本土派的三支重要力量，‘民族爱国派’、共产主义者和欧亚派虽然在具体的纲领主张上各有不同，但‘反西方主义’理念将他们联结起来，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基础。”^①然而，无论是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在反对向西方靠近、迫使叶利钦政府改弦更张的同时，都未能将俄罗斯从地缘政治困境中解救出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和不断打压，俄罗斯再次走向第三条道路——新欧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重新活跃起来的新欧亚主义不同于古典欧亚主义，它从地缘政治学角度解析俄罗斯文明的属性，探究俄罗斯历史和未来发展道路，并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潮而影响着俄罗斯当局的对外战略。这一方面是新一轮东西之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导致的自我救赎。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代表人物杜金，用自己的地缘政治学说推演出一套反抗西方世界的政治方案。他毫不掩饰地将美国、北约和西方国家视为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和敌人，并提出“第四种政治理论”，即“从哲学层面上批判欧美现代哲学对人存在本质的遗忘，在政治层面上反抗自由主义，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其明确的目标是：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重新达到世界的新两极，使欧洲大陆联盟成为反抗大西洋主义的新的一极，随后借两极的有利地缘政治空间开辟出多极性道路”^②。显然，杜金的思想中渗透着强烈的反西方主义情绪，虽然他被西方媒体称为“普京的大脑”未必恰当，但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俄罗斯政府及高层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总统普京的执政理念。在国家身份认同上，普京确认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在文明归属上，普京强调俄罗斯属于欧亚文明，在思想价值观上，普京肯定新欧亚主义的价值理念可以重塑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怀，凝聚俄罗斯的团结力量。

在世纪之交临危受命的普京迅速从靠近“西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为振兴俄罗斯和恢复大国地位找到了确立民族信心和文明身份的思想定位，无论是他

^① 张昊琦：《俄国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

^②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的“俄罗斯新思想”，还是“主权民主”“新爱国主义”，抑或是保守主义、“普京主义”，其中都能找到新欧亚主义的影子。而与此同时，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培植的反西方主义也一直是普京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逐渐扩大，北约推进到了俄罗斯的西部边界，欧盟也深入到俄罗斯传统的经济和文化领域，普京政府不得不在抵制美国主导的霸权行动中努力捍卫国家利益，试图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早在 2007 年的慕尼黑演讲中，普京就已经激烈抨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滥用武力”，反美反西方的意味明显；2008 年的俄格冲突，无疑是普京对美国背后支持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的强硬反击；2014 年乌克兰危机中，俄合并克里米亚，控制顿巴斯，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反对毫不示弱；2015 年，俄罗斯突然在叙利亚展开大规模直接军事干预，对抗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制裁，在争夺中东地缘政治利益中同样没有退让。事实上，在 2011 年之后，针对北约东扩和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体系，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针锋相对。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持续恶化，美欧在各种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对俄施加外交压力，挤压其地缘空间，并极力加大反俄宣传的力度，抹黑普京的个人形象，丑化其为“独裁者”，同时还竭力在俄国内及其“后院”培植亲西方势力，有意激化矛盾，鼓动反对派力量，多次掀起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面对美西方的强大攻势，俄罗斯坚决反击，以攻为守，全力维护自身安全 and 国家利益。2017 年和 2019 年，俄议会上下院分别成立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防止干涉临时委员会”和“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事实调查委员会”；2018 年，普京签署了《反制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的措施法》；2019 年，俄推出《主权互联网法》，维护国家信息安全；2013 年，普京在《纽约时报》网站刊文抨击西式民主充满陷阱，批评美国使用武力干涉他国的做法；2020 年，普京撰文驳斥美欧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将卫国战争史作为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此外，普京还斥巨资打造强力外宣，开办“今日俄罗斯”英语电视台、组建“卫星”通讯社、在世界各国开设新闻中心，通过正面宣传俄国家形象反击西方媒体对俄的歪曲性报道^①。总之，普京时期的反西方主义已经从思想层面深入到国家政策层面，与政治实践全面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反排挤、反制裁和反干涉的最新面貌。

近一百年来的俄罗斯历史充满了动荡和不安，这个位于欧亚大陆的大国曾两

^① 蒋莉、李静雅：《西方与俄罗斯的干涉和反干涉》，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0 期。

次令全世界震惊和感叹。在这一百年中，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无疑是关键词，反西方主义也在俄罗斯与美国、欧洲的轮番博弈中被不断激活和强化。历史的延续性奇迹般显现出来，上一个百年中出现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重现为欧洲—大西洋主义与现代斯拉夫主义之争，一个世纪前出现的欧亚主义重新复活为当代的新欧亚主义。然而，传统的文明之争已经被赋予了更加丰富和多维的涵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已经从思想层面的文明争论转变为政治层面的政策实践。随着俄美关系和俄欧关系的日趋紧张，当代俄罗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积极发声，与西方争夺话语权，同时也加强“向东看”，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然而，不能忘记，俄罗斯的根本目的不是转向东方，而是要解决自己与西方的问题^①。

结 语

俄罗斯民族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纵观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欧洲文明。然而，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交往并非一帆风顺，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恐惧之情由来已久，而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也在历史交往中逐渐强烈，经历了从朦胧到成熟、从思想到政治的发展历程。

讨论俄罗斯对待西方世界的态度及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对策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过程具有反应性和动态性，因为国家形象总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构建的。对俄罗斯来说，有几个重要的“他者”，而且这份名单在不断变化，但“西方”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与欧洲的碰撞和交流逐渐展开和深入。几个世纪过去了，西方形成了针对俄罗斯的“恐俄症”，而俄罗斯则相应地出现了反西方主义，这既是文化冲突的结果，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体现。以赛亚·柏林说过：“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没有哪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不受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的极端仇视。俄国觉得她占领的这块土地上的‘西徐亚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这种尴尬的地位在她内心产生了一种永远难以克服的恐惧症。”^②

^① 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0页。

^② [英]以赛亚·柏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页。

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是俄罗斯民族认同和文明定位中的二律背反。所谓“东方”“西方”其实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一种历史观念，是西方文明发展史遗留下来的文化概念。然而，俄罗斯精神深处是希望融入“西方”的。尽管早在 18 世纪俄罗斯人就已经认为自己属于欧洲，但代表着“文明、开化、科技、民主、自由”的西欧并不认可，而是将其归入“野蛮、蒙昧、传统、独裁、禁锢”的东方世界。因此，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文化定位和文明认同的过程中，“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角力”^①。自认为属于欧洲的俄罗斯并不愿意脱离欧洲，也无时无刻不期待欧洲的接纳和认可，它从骨子里是崇尚西方文明和文化价值观的，只是不想完全照搬，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正因为俄罗斯人骨子里认为自己就是欧洲人，就是“西方”的一分子，因此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定位是矛盾的，反西方主义也是矛盾的。“自我”与“他者”的定位重叠，界限模糊，位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外人中的自己人、自己人中的外人”^②。

然而，别尔嘉耶夫说过，“要解开隐藏于俄罗斯精神之中的谜团，可先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承认其可怕的矛盾性”^③。历史上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反的并不是纯粹对立的“西方”，而是自己内心追求融入的“欧洲”，俄罗斯并不是彻底与“欧洲”决裂，而是反对“欧洲”对它的排斥。早在一百年前津科夫斯基就曾说过：“欧洲已经不是在我们外部，还是我们内部——不仅是文化范畴上，宗教范畴上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形式的反西方主义都是不正确的和危险的原因，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俄罗斯人的内心。”^④几百年来，俄罗斯对欧洲怀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情感。俄罗斯文化中存在认为俄罗斯只是“迷失”但仍是欧洲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我们与西方来自同一个物质文明世界……后来，我们在与许多国家的联盟和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下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明。但是，我们从未说过与西方决裂。”^⑤“俄罗斯是一个在文化上与欧洲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在这种欧洲内部的对话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⑥尽管如此，它却经

①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 2 页。

②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14 +), 9 апреля 2018 года. <https://www.kp.ru/daily/26817/3853772/>

③ Бердяев Н. 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1990 г. С. 10.

④ [俄]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 263 页。

⑤ Кара - Муза С. Г. Европоцентризм - эдипов комплекс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М. : Алгоритм, 2002. С. 9.

⑥ Кара - Муза А. А. Идя в Европу, мы возвращаемся домой//Западники 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Возможен ли диалог? 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куссии. М. : ОГИ, 2003. С. 375.

常引起欧洲的拒绝，深受欧洲“恐俄症”的伤害，这被俄罗斯精英们认为是西欧征服俄罗斯并摧毁其独特性的欲望的表达。

然而，西方深受几百年来历史观念的影响，一直不接受俄罗斯，而是将其视为文明和政治的竞争对手，企图改造它的“野蛮性”或从文明进程中“消灭”它。所以，尽管俄罗斯文明不止一次在意识形态上发生质的变化，但与政治上领先的“西方”相比，它始终是个“外人”。直到20世纪末，美国人亨廷顿还为欧洲画出了一条界线，这既是政治和经济边界，也是文化边界，这条线与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民族与东正教和穆斯林民族分开的界线不谋而合^①。

时至今日，“西方”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今天的“西方”与19世纪俄罗斯精英们口中的“西方”已然不同，“东—西方”问题也衍生出了新的地缘政治维度。当代俄罗斯执政精英普遍认为：西方社会不是共同家园，俄罗斯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俄罗斯人内心中对“西方”的认可还是传统的文明概念，俄罗斯人想要回归和融入的都是没有美国的欧洲，他们对美国只有敌对和排斥，而对欧洲却带有不同的感情。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全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在对西方主流国家的接受态度上存在明显差异，2014年对法国的评价比美国高43分（2017年高30分），俄民众普遍认为法国是“最好的”国家，美国是“最差的”国家，而德国和英国的形象则在二者之间波动^②。这表明政治上已有定论的“反西方主义”绝不会发展成对所有西方国家的整体拒绝。当代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对西方世界有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划分：针对美国，俄罗斯采取坚决的对立态度，反美主义日渐强烈，竭尽全力与美国展开政治博弈；针对欧洲，俄罗斯则另眼相看，试图分而治之，通过改善与个别欧洲国家关系的外交手段来缓和整体上的俄欧关系。因为“政治上，俄罗斯希望与欧盟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制衡美国，提升俄大国地位。文化和精神上，俄罗斯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融入欧洲对俄罗斯人而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更是精神上的回归，是‘回家’”^③。

然而，试图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对立状态谈何容易。经过连续十几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38页。

② Латов Ю. В. Анти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 в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менталит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оссиян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 4 (20), 2017.

③ 庞大鹏、柳丰华、徐坡岭等：《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2000~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9页。

年的摩擦，特别是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的碰撞，美国和西方已经逐渐积聚起浓厚的反俄思想基础，并最终认定，指望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是幼稚的，这也是美国国会 2017 年高票通过“反击俄罗斯法”的深层原因^①。与此同时，尽管俄罗斯学者认为 2014 年对乌克兰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合并克里米亚激发了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令社会大众和社会精英团结在一起。但事实证明，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不再主张与俄罗斯联合的欧亚大陆体系，而是主张美国和北约参与安全事务的欧美大陆体系。因此，现阶段俄罗斯的主动反西方主义，也激化了俄罗斯新的“孤立主义”。

不得不说，2014 年之后，俄罗斯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孤立处境越来越明显。西方似乎已经认定，俄罗斯是“一头不可能被驯服的熊”，苏联的解体并不彻底，普京将会复活并加强苏联之前的体制、制度、经济机构和社会习俗，俄罗斯数百年历史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已成为压倒式的社会情绪，进一步走向孤立主义难以避免。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在《混血者的孤独》一文中坦白地说，自 2014 年起，俄罗斯将迎来百年地缘政治孤独，但孤独并不意味着完全孤立^②。历史已经证明，完全孤立与无限开放都是不可能的，俄罗斯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因此，“纯粹的孤立主义也并非俄罗斯的夙愿，不论其内在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性格，还是外在的国际环境以及时代的发展潮流，都不允许俄罗斯彻底走上孤立主义之路”^③。对于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针锋相对和西方视野里的“普京难题”，俄政治精英们也持不同观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新的政治周期内俄罗斯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会管控与西方的矛盾，将俄美关系稳定在一种可控的对立状态中^④。也有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俄罗斯并不是要颠覆西方，也并不拒绝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俄罗斯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要寻求与西方国家不可逆转的决裂，一旦能找到令人满意的恢复联系的方案，俄罗斯就会寻求改善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⑤。然而，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何时能出现一种令双方都满意的关系修复方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08 页。

②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14 +).

③ 张昊琦：《俄国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

④ 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第 260 页。

⑤ [英] 理查德·萨克瓦：《“大俄罗斯”构想：莫斯科打算颠覆西方吗？》，载《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2 期。